

朱熹《楚辞集注》篇目考察*

徐 涓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厦门 361005)

摘要:朱熹持道文统一并以道为本的道文观念,注重对作作者的道德行为加以考察,并以此对《楚辞集注》篇目进行安排。他因推崇屈原之道德行为而将其二十五篇划分为“离骚”类,奉为经;将宋玉等人的作品划分为“续离骚”类,归为传;将作者道德不合儒家理想规范的东方朔、王褒、刘向及王逸等人的作品删去,增加有经世之才的贾谊所作赋两篇。

关键词:朱熹;道德行为;《楚辞集注》;篇目

中图分类号:I207.2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4)03-0171-006

朱熹以道文观念为指导,于《楚辞集注》篇目选择上遵循“性情”与“义理”兼得之原则,他在王逸《楚辞章句》基础上,将屈原创作之二十五篇划分为“离骚”类,而将宋玉、景差、贾谊、庄忌、淮南小山等创作之八题十六篇作品划分为“续离骚”类,并将东方朔《七谏》、王褒《九怀》、刘向《九叹》以及王逸《九思》等四篇删去,而增加贾谊《吊屈原》、《服赋》两篇。

一、划分“离骚”类与“续离骚”类

朱熹将屈原的《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等二十五篇定为五卷,归为“离骚”类,将宋玉之《九辩》、《招魂》,景差之《大招》,贾谊之《惜誓》、《吊屈原赋》、《服赋》,庄忌之《哀时命》以及淮南小山之《招隐士》共十六篇定为“续离骚”类。朱熹之所以这样去区分,在于他认为“经”“传”有别,乃秉承孔颖达之“凡非正经者谓之传”的主张。他在《楚辞辩证》中说:

洪氏目录《九歌》下注云:“一本此下皆有传字。”晁氏本则自《九辩》以下乃有之。吕伯恭《读诗纪》引郑氏《诗谱》曰:“《小雅》十六篇、《大雅》十八篇为正经。”孔颖达曰:“凡书非正经者谓之传,未知此传在何书也?”按《楚辞》屈原《离骚》谓之经,自宋玉《九辩》以下皆谓之传。以此例考之,则《六月》以下,《小雅》之传也;《民劳》以下,《大雅》之传也。孔氏谓凡非正经者皆谓之传,善矣;又谓不知此传在何书,则非也。然则吕氏实据晁本而言,但洪、晁二本,今亦未见其的据,更当博考之耳。^[17]

朱熹考证洪兴祖、吕伯恭、晁补之、孔颖达诸说,但依然有些疑义,不知的确证据何在,但因朱熹尊崇屈原,故而从孔颖达之说,尊屈原所作为经,而后续者为传。这在《朱子语类》中也有论及:

问:“分‘诗之经,诗之传’,何也?”曰:“此得之于吕伯恭。风雅之正则为经,风雅之变则为传。如屈平之作《离骚》,即经也。如后人作《反骚》与《九辩》之类则为传耳。”^[2]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 www.jhlt.net.cn

*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百年朱子学研究精华集成”(12JZD007)

作者简介:徐涓(1981—),女,安徽潜山人,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朱子学。

学生问为何要分《诗》之经、传,朱熹说此乃从吕祖谦之观点,以风雅之正、变分为经、传,举例如屈原之《离骚》即为经,而后人作便为传。

朱熹尊屈原文章为经,源于其道文观,因为对屈原道德品行之尊重,所以推崇其文章,以为典范他说:“原之为入,其志行虽或过于中庸而不可以为法,然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原之为书,其辞旨虽或流于跌宕怪神、怨怒激发而不可以为训,然皆生于缱绻恻怛、不能自己之至意。虽其不知学于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独驰骋于变《风》、变《雅》之末流,以故醇儒庄士或羞称之。然使世之放臣、怨妻、去妇,投泪讴吟于下,而所天者幸而听之,则于彼此之间,天性民彝之善,岂不足以交有所发,而增夫三纲五典之重?此予之所以每有味于其言,而不敢直以‘词人之赋’视之也。”^[1]朱熹认为屈原之志行或有不合中庸之处,但都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其书都出于缱绻恻怛、不能自己之至意,故而其辞赋不能仅仅看作词人之赋,而应当作有补世教的教材。屈原这种诚心、至意就源于道,而屈原辞赋就是出于道的诗文,故朱熹便认为《楚辞》与《六经》作用一样。

朱熹认为道与文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他在《读唐志》中论道:“欧阳子曰:‘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论也。然彼知政事、礼乐之不可不出一,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于二也。”^[3]朱熹明确指出“道德”与“文章”也是不可分离的。这个“道”是以三代圣贤之伦理道德为楷模,其实指向作文者之道德品行。他说:“夫古之圣贤,其文可谓盛矣,然初岂有意学为如是之文哉?有是实于中,则必有是文于外,如天有是气则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则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圣贤之心,既有是精明纯粹之实以旁薄充塞乎其内,则必著见于外者,亦必自然条理分明,光辉发越不可掩盖,不必托于言语、著于简册,而后谓之文,但自一身接于万事,凡其语默动静,人所可得而见者,无所适而非文也。姑举其最而言,则《易》之卦画、《诗》之歌咏、《书》之记言、《春秋》之叙事,与夫礼之威仪、乐之节奏,皆已列为《六经》而垂万世,其文之盛,后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岂无所自来,而世亦莫之识也。”^[3]古者圣贤之文出

于道,譬如最经典之《六经》。道与文统一不可分割,但相比较而言,道是文的根本,道具有本源性,文为派生性的,有道才有文,“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4]这就是朱熹的道文统一但又以道为根本的道文观。朱熹对屈原之道德品行极为推崇,便认为屈原文章出于“道”,朱熹曾亲自撰写《修三闾忠洁侯庙奉安祝文》,据《文集》记载:

惟神为国上谋,遭馋放逐。行吟憔悴,厥有《离骚》。长沙自沉,勇赴兹水。遗祠锡号,帝有愍书。吏情不供,神用弗宇。乃今修奉,亦既讫功。敢饌灵神,敢陈椒醕。唯神将鉴,永奠厥居。^[5]

此文描写屈原为国事而遭放逐,在行吟憔悴时候作《离骚》,自沉湘水,勇气可嘉。如今修供奉之祠,让屈原神灵得屋宇以便居住。又奉上酒水美食,让神灵永远居住于此。

朱熹以为屈原之道德品行主要表现为“忠君爱国之诚心”,因为忠君爱国,所以屈原之《楚辞》从未怨君,这在《朱子语类》中有论及:

屈原一书,近偶阅之,从头被人错解了。自古至今,讹谬相传,更无一人能破之者,而又为说以增饰之。看来屈原本是一个忠诚恻怛爱君底人。观他所作《离骚》数篇,尽是归依爱慕,不忍舍去怀王之意。所以拳拳反复,不能自己,何尝有一句是骂怀王。亦不见他有偏躁之心,后来没出气处,不奈何,方投河殒命。而今人句句尽解做骂怀王,枉屈说了屈原。只是不曾平心看他语意,所以如此。^[4]

朱熹认为屈原是一位忠诚恻怛爱君之人,在《离骚》等篇中,都是缱绻爱慕、恋恋不舍之意,没有一句骂怀王。最后楚国灭亡,屈原投河殒命,是无奈之举。而今解说为骂怀王,实属误解。朱熹以为《九歌》篇也是托神为君,而非怨君。他说:

《楚词》不甚怨君。今被诸家解得都成怨

君,不成模样。《九歌》是托神以为君,言人间隔,不可企及,如己不得亲近于君之意。以此观之,他便不是怨君。至《山鬼》篇,不可以君为山鬼,又倒说山鬼欲亲人而不可得之意。今人解文字不看大意,只逐句解,意却不贯。^{[4]4288-4289}

由此观之,朱熹将屈原所作二十五篇划分为“离骚”类,将宋玉等十六篇归为“续离骚”类,实乃出于对屈原忠君爱国之道德行为的尊崇。

二、删去《七谏》、《九怀》、《九叹》、《九思》

朱熹持道文统一说,故考察朱熹删去《七谏》等四篇,须先考虑此四者之道德品行。

《七谏》为东方朔所作。东方朔字曼倩,乃汉武帝时文学侍臣,为人机智幽默,谈吐诙谐,雄辩滔滔,应答如流。据《史记·滑稽列传》记载,东方朔“以好古传书,爱经术,多所博观外家之语”^[6]。武帝数次召前谈论,其幽默滑稽皆令皇帝开心不已。但其行为放诞,尝娶长安女子为妻,一年一换,所赐钱财皆打发弃妇,当时之人呼之为“狂人”。又据班固《汉书》记载,他曾多次谏议武帝,如武帝欲辟南山为上林苑,东方朔就谏议不可。武帝宠信男宠董偃,东方朔指出董偃败坏风俗,应该杀之。“朔虽诙笑,然时观察颜色,直言切谏,上常用之。自公卿在位,朔皆敖弄,无所为屈。”^{[7]2860}但班固又引用扬雄之言,指明东方朔之言过其实、放诞任性的一面,认为其文辞浅薄,不足称道,“而扬雄亦以为朔言不纯师,行不纯德,其流风遗书蔑如也。”^{[7]2873}其赋作《七谏》,缅怀屈原,追思贤主,全赋有七个部分:初放、沉江、怨世、怨思、自悲、哀命、谬谏。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说:

《七谏》者,东方朔之所作也,谏者,正也,谓陈法度以谏正君也。古者人臣三谏不从,退而待放,屈原与楚同姓,无去之义,故加为《七谏》,殷勤之意,忠厚之节也。或曰,《七谏》者,法天子有争臣七人也。东方朔追悯屈原,故作此辞,以述其志,所以昭忠信矫曲朝也。^{[8]74}

王逸认为,古者人臣三谏而君不从,便退而

等待放逐,而屈原乃与楚王同宗,故无离去之理,东方朔用《七谏》为题,谏之次数愈多,更能体现屈原之殷勤、忠厚。

《九怀》为王褒所作。王褒字子渊,汉宣帝时谏议大夫。朝廷修撰武帝时之典章制度,征召能讲论六艺群书、讽诵《楚辞》之人,王褒与刘向、张子侨、华龙、柳褒等人一起待诏金马门。“初,上闻褒有俊才,召见,使为《圣主得贤臣颂》。”^[9]宣帝数次与王褒等人一起狩猎,所到宫馆,便命他们作赋歌颂,品论高下,以便赏赐金帛。议论者多认为这是淫靡奢侈,宣帝不以为然,认为“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譬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悦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10]正因为皇帝倡导辞赋,王褒便由此被提拔为谏议大夫。汉宣帝好神仙,公元前61年,曾派遣王褒去求取金马碧鸡之神灵。其后,皇太子身体欠安,王褒为其诵读辞赋,太子得愈。太子本人非常喜欢听王褒诵读《甘泉赋》与《洞箫赋》,王褒离开后,竟然命令后宫左右都去诵读。由此可知,王褒乃皇帝文学侍从,所作多为娱情悦目之属。

王褒赋作《九怀》,仰慕屈原文采,感叹其遭遇不幸,全赋有九个部分:匡机、通路、危俊、昭世、尊嘉、蓄英、思忠、陶壅、株昭。

《九怀》者,谏议大夫王褒之所作也。怀者,思也,言屈原虽见放逐,犹思念其君,忧国倾危而不能忘也。褒读屈原之文,嘉其温雅,藻采敷衍,执握金玉,委之污渎,遭世浑浊,莫之能识,追而愍之,故作《九怀》,以裨其词,史官录第,遂列于篇。^{[8]88-89}

王逸以为,“怀”为思念,此篇述写屈原虽然放逐,但仍然忧国而无法忘怀。王褒阅读屈原之文,被其辞采所折服,追悯其遭遇,而作《九怀》。通读《九怀》,可知此篇辞句华丽、词气温雅,可以愉悦耳目,畅适性情。

《九叹》为刘向所作。刘向为汉高祖刘邦弟楚元王刘交之四世孙,家学底蕴深厚,年少时即博览群书。汉宣帝召见刘向与王褒、张子侨等为文学侍臣,讲诵经书。刘向历宣帝、元帝、成帝三朝,曾几次下狱,多次上奏章,谏诤言事,以阴阳灾异

比附现实朝廷政事。宣帝时候,刘向因铸造伪黄金事下狱。元帝时候,中书宦官弘恭、石显弄权,刘向与朝中忠直大臣萧望之、周堪等欲罢退此二人,语泄下狱。出狱后,刘向上书皇帝为萧望之辩解,因而更加得罪弘恭、石显二人,遂被免为庶人。汉成帝即位,诛杀石显,复用刘向,刘向数次奏议皇帝,迁为光禄大夫。刘向位居大夫近三十年,一直谏议皇帝抑制外戚王氏专权,然皇帝终不肯用其言。刘向死后十三年,王莽篡汉。汉成帝命令刘向整理经书,刘向分《楚辞》为十六卷,《汉书·艺文志》著录其赋作有三十三篇,今仅存《九叹》一篇,全赋有九个部分:逢纷、离世、怨思、远逝、惜贤、忧苦、愍命、思古、远游。王逸说:

《九叹》者,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刘向之所作也。向以博古敏达点校经书,辩章旧文,追念屈原忠信之节,故作《九叹》。叹者,伤也,息也,言屈原放在山泽,犹伤念君,叹息无已,所谓赞贤以辅志,骋词以曜德者也。^{[8]93-94}

王逸认为,刘向在点校经书之际,追念屈原忠信节操,所以作《九叹》,叹息屈原被放逐,仍然思念君王,王逸指出刘向是借赞诵前贤来托显志向,驰骋词章来显曜德行。

朱熹晚年与弟子讲学,喜欢将汉儒董仲舒与刘向相比较,认为刘向文风较平实,也指出他本人虽博学广闻,但对大道研究不深。这在《朱子语类》中可见:

仲舒文实。刘向文又较实,亦好,无些虚气象;比之仲舒,仲舒较滋润发挥。^{[4]4291}

汉儒董仲舒较稳。刘向虽博洽而浅,然皆不见圣人大道。^{[4]4202}

《九思》为东汉王逸所作,《后汉书》记录王逸极为简略,徒著其著作《楚辞章句》通行世间。从王逸自作《九思》序中,也可窥见其作赋之心态。

《九思》者,王逸之所作也。自屈原终没之后,忠臣介士游览学者读《离骚》、《九章》之文,莫不怆然,心为悲感,高其节行,妙其

丽雅,至刘向、王褒之徒,咸嘉其义,作赋骋词以赞其志,则皆列于谱录,世世相传,逸与屈原同土共国,悼伤之情与凡有异,窃慕向、褒之风,作颂一篇,号曰《九思》,以裨其辞。未有解说,故聊训诂焉。^{[8]108-109}

王逸认为,屈原之后,忠臣介士读其文,皆悲戚怆然涕下,为屈原之高雅节操、妙丽文采所折服,刘向、王褒就曾仿作以托显志向,被载入史册并代代相传,而自己与屈原同乡,悲悼之情感自然与凡俗不同,故而效仿刘向、王褒做法,也作赋一篇。这里王逸明显说出自己作《九思》之目的,就是追慕屈原之风,效法刘、王,以便名留后世。

综上,可知东方朔是在为皇帝排忧解难中寄托追思而作《七谏》;王褒是在为皇帝歌功颂德中倾慕屈原文采而续《九怀》;刘向是在奉命点校经书整理《楚辞》时而赋《九叹》;王逸是想效仿王褒、刘向之做法从而名留史册而著《九思》。此四者都是仰慕屈原之风,而续仿其义,并未结合自身之遭际进行创作,故朱熹对其表示不满,认为这是无病呻吟。他在《楚辞辩证·上》中说:

《七谏》、《九怀》、《九叹》、《九思》,虽为骚体,然其词气平缓,意不深切,如无所疾痛而强为呻吟者。就其中《谏》、《叹》犹或粗有可观,而王则卑已甚矣。故虽幸附书尾,而人莫之读,今亦不复以累篇帙也。^{[1]172}

朱熹认为东方朔、王褒、刘向、王逸的四篇作品在形式上为骚体,可是内容或远于性情,或意义并不深切,有如无病呻吟,非兼得“性情”与“义理”之作。其实这里朱熹所斥的无病呻吟就是针对这四篇的作者没有屈原那种遭际,也就没有屈原那种道德品行,故而这四篇辞赋自然就没有屈原那种深切而呼唤苍天、疾痛而呼喊父母之幽蹙怨慕。朱熹在《楚辞辩证·下》中再次强调说:“王逸所传《楚辞》篇次,本出刘向。其《七谏》以下,无足观者,而王褒为最下,余已论于前矣。”^{[1]206}这四篇又有不同,其中《七谏》、《九叹》还可供一览,联系东方朔、刘向之德行,也可理解。此二人都多次谏议皇帝,但不为所用。但王褒就不同,为帝王文学侍从,所作又温婉妍丽,朱熹便认为其词气卑下,尤其不便著录。此四篇虽然附于书尾,但人们并不读,不

如删去。朱熹在道为文先之思想指导下,本着“性情”与“义理”兼得之原则,毅然删去此四篇。

三、增入《贾谊》之《吊屈原赋》、《服赋》

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自屈原沉汨罗后百有余年,汉有贾生,为长沙王太傅,过湘水,投书以吊屈原。”^{[11]2491}屈原死后百余年,贾谊遭馋被贬,感叹自己遭遇,著文凭吊屈原,《史记》将贾谊与屈原合传。贾谊少时,便才华横溢,十八岁以能诵《诗》、《书》,闻名郡中,后经人举荐,汉文帝召为博士,于诸博士中,贾谊才二十余岁,最为年少。文帝诏议,诸生不能应对,独贾谊表现出众,汉文帝大悦,一年之中即迁升贾谊至太中大夫。贾谊上谏文帝“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11]2492},是时,文帝初即位,诸律令之所出,各诸侯之就国,其说皆从贾谊所发,于是文帝召议以贾谊为公卿,而朝中大臣如周勃、灌婴、张敖、冯敬皆谮毁之,文帝乃贬谪贾谊为长沙王太傅。长沙路远地湿,贾谊以为自己命当不久,路过湘水,感叹自己遭馋被贬,作《吊屈原赋》。

贾谊寓居长沙三年,一天,有服鸟飞入贾谊之宅,服鸟似鸮,为不祥之鸟,贾谊托服鸟以自况,作《服赋》。一年后,贾谊重被文帝召见并询问鬼神之事,竟然至夜半方罢。唐人李商隐有诗句讥讽道:“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文帝以为贾谊不过如此,乃复贬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骑马摔死,岁余,贾谊也郁郁而终,终年三十三岁。

又据《汉书》,贾谊多次上书谏议政事,当时诸侯王族僭越礼制,贾谊奏议削弱诸侯。后,大臣周勃被告谋反,下狱,经查,无罪释放,贾谊以此讥文帝,文帝感其言,后待大臣有礼有节。班固引刘向之言称赞贾谊:“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然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使时见用,功化必盛。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12]贾谊赋作《吊屈原赋》、《服赋》,《史记》、《汉书》全文著录。

朱熹晚年讲学,经常论及贾谊其人、其学及其书,指出贾谊根底乃战国纵横家之学,但因其所见道理明澈,故说的好,对贾谊表现出敬意。

贾谊之学杂。他本是战国纵横之学,只是较近道理,不至如仪秦蔡范之甚尔。他于这边道理见得分数稍多,所以说得较好。然终是有纵横之习,缘他根脚只是从战国中来故也。^{[4]4239-4240}

朱熹还经常将贾谊与晁错、董仲舒等人文章相比较,认为贾谊文字典实。

汉初贾谊之文质实。晁错说利害处好,答制策便乱道。董仲舒之文缓弱,其答贤良策,不答所问切处;至无紧要处,有累数百言。东汉文章尤更不如,渐渐趋于对偶。^{[4]4291}

由上可知,贾谊作《吊屈原赋》、《服赋》,乃因事而赋,有感而发,作品结合自身处境,追悼屈原遭际,所以读来能感人至深。而此两篇,非长篇巨制,乃短小精炼,言简而思深,在篇幅、形式及内容上皆不同于《七谏》、《九怀》、《九叹》、《九思》这四篇之续屈原意,故被朱熹极为推崇,认为贾谊之辞赋代表西汉时期最高水平。

朱熹对贾谊之推崇,也表现在对《惜誓》一篇作者之认定上,朱熹以为非贾谊而不能作。他说:

《史》、《汉》于《谊传》独载《吊屈原》、《服鸟》二赋,而无此篇,故王逸虽谓“或云谊作,而怀疑不能明”,独洪兴祖以为其间数语与《吊屈原》词指略同,意为谊作亡疑者。今玩其辞,实亦瑰异奇伟,计非谊莫能及,故特据洪说,而并录《传》中二赋,以备一家之言云。^{[1]153}

对于《惜誓》一篇,王逸以为贾谊所作,又怀疑不是,而洪兴祖考察词句,认为乃贾谊之作无疑义,朱熹从洪氏说,认为其文辞瑰伟,非贾谊莫能及此。朱熹对贾谊赋作之推崇,在《楚辞辩证》中也有明白表述:

贾傅之词,于西京为最高,且《惜誓》已著于篇,而二赋尤精,乃不见取,亦不复晓,故今并录以附焉。^{[1]172}

朱熹认为贾谊之赋作代表西汉最高水平,《惜誓》一篇王逸、洪兴祖已经选取,而《吊屈原赋》、《服赋》这两篇精良之作,却未收入,甚是可叹,故将其并录入,以备一家之言。他说:

独贾太傅以卓然命世英杰之材,俯就骚律,所出三篇,皆非一时诸人所及。而《惜誓》所谓“黄鹄之一举兮,见山川之迂曲。再举兮,睹天地之圆方”者,又于其间超然拔出言意之表,未易以笔墨蹊径论其高下深浅也。^{[1]206}

朱熹认为贾谊才华卓绝,三篇赋作都是其同时人所莫及,其中《惜誓》句意超然拔俗,而篇意以悼念屈原自喻,朱熹在《吊屈原赋》序言上说:

谊追伤之,投书以吊,而因以自喻,后之君子,盖亦高其志,惜其才,而狭其量也。^{[1]157}

朱熹对贾谊之崇敬,依然是从他的道文观念去理解的,所以他不甚认同司马迁对贾谊文章的批评,而予以辩驳,他说:

史公读之,叹其同生死,轻去就,至为爽然自失。以今观之,凡谊所称,皆《列御寇》、庄周之常言,又为伤悼无聊之故,而籍之以自诋者,夫岂真能原始之反终,而得失朝闻夕死之实哉!谊有经世之才,文章盖其余事,其奇伟卓绝,亦非司马相如辈所能仿佛。而扬雄之论,常高彼而下此,韩愈亦以马、扬侧于孟子、屈原之列,而无一言以及谊,余皆不能识其何说也。是以因序其赋,而并论之,以俟后之君子云。^{[1]159-160}

朱熹认为,贾谊以经世致用为主要任务,而文章乃业余所为,他在《服赋》中用老庄之语,就不能简单加以否定,贾谊绝非司马相如那一类人,而扬雄无见识地认为司马相如比贾谊高,以及韩愈竟然将司马迁、扬雄与孟子、屈原相提并论而只字不提及贾谊等做法,这是无法理解的。

所以朱熹在其赋序中,将贾谊其人其书一并加以议论,以启发后世之君子。其实,朱熹推崇贾谊,还是推崇他的道德品行方面。

结 语

作为理学家的朱熹,在其文学思想上依然无法摆脱以道为本、以文为末的观念,他首要关注的不是文章背后的道,而是作文者之道,也就是作文者是否有圣贤之道德,他推崇之赋作,其作者之道德也定是合乎儒家伦理典范的,否则便认为是无病呻吟之作,未能兼得“性情”与“义理”。

参考文献:

- [1][南宋]朱熹.楚辞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 [2]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十七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2767.
- [3]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二十三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4]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十八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5]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二十四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4050.
- [6][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六)[M],北京:中华书局,1963:3205.
- [7][东汉]班固.汉书(卷六十五)[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8][东汉]王逸.楚辞章句//[M]四库全书第106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9]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八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370.
- [10][东汉]班固.汉书(卷六十四下)[M],北京:中华书局,1962:2829.
- [11][西汉]司马迁.史记(卷八十四)[M],北京:中华书局,1963.
- [12][东汉]班固.汉书(卷四十八)[M],北京:中华书局,1962:2265.

(责任编辑 黄胜江)